

试论《天问》所反映的 周、楚民族的两次斗争

——《屈赋新探》之八※

汤炳正

屈赋以《天问》为最难读。历代学者对其中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以及文字训诂的钻研探讨，用力最勤。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尤其是第一手材料的不易见到，以致有很多问题，至今仍然得不到解决。例如《天问》里有下列两节云：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
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
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本来这两节诗所诘问的是周昭王与周穆王的历史事实，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中的“成游”“巧梅”等词语（尤其是“巧梅”），不仅古今版本的文字多异，而且历代注家的训诂，也够使人眼花缭乱。要在其中找出接近事实的结论是很难的。因而也就影响了我们进一步理解屈原这两节诗里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与思想感情。幸而近年来陕西扶风出土了西周窖藏的《史墙盘》，其铭文的内容极丰富，使我们有可能对上述问题作一番新的探索。

（一）“成游”“巧梅”的含义及其历史内容

《史墙盘》作于周共王时代，故铭文一开始就用简括的语言历述和颂扬了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六代的历史业绩。共王是周王朝的第七代，距昭、穆二王时间极近。因而这无疑是研究昭、穆二王历史事迹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现节录其中称述昭王、穆王的一段原话如下：

“竄（弘）魯邵（昭）王，广猷（答）楚荆（荆），位（唯）寤（狩）南

※《屈赋新探》之六，篇幅较长，尊重作者意见，不再续刊；之七《释溇》已发表于北京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文史》本年第九期。——编者

行。祗显（显）穆王，升（刑）帅宇（讨）侮（谋），繇（纒）宁天子。”（参唐兰、裘锡圭两同志释文。如“霏”从唐兰同志释“狩”，“宇侮”从裘锡圭同志释“讨谋”。皆详《文物》1978年3期。）

从这段铭文里，很显然可以看出：所谓“弘鲁昭王，广筴楚荆，唯狩南行”，实际上跟《天问》里的“昭后成游，南土爰底，……”所指的是同一件事；铭文所谓“祗显穆王，刑帅讨谋，纒宁天子”，实际上跟《天问》里的“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所指的也是同一件事。其间不仅史事相同，甚至所用词语亦多相同。因此，只有以《史墙盘》铭文这一原始资料为依据，才能对“成游”“巧梅”等作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也只有从解释“成游”“巧梅”等词语入手，才能对周、楚民族的两次斗争以及屈原对这两次斗争的态度，作出较为合理的分析与探索。

首先谈“成游”：

对“昭后成游，南土爰底”，王逸注云：“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沈之而遂不还也。”这条注文，把“成游”解释为“背成王之制而出游”，显然跟正文之义又不相合。因此，刘师培《楚辞考异》认为“据注，后疑作倍。”意欲改正文的“后”字作“倍”，为王注“背”字找根据。而不知“增字解经”，乃王注惯例。“以注文校正文”的校勘方法，在此并不适用。因为根据金文及典籍，周之南行伐楚，正自成王始。故所谓“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云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自王逸之后，“成游”一语，新解极多。如或谓：“成游，谓成南征之游。犹所谓斯游遂成也。”（洪兴祖）或谓：“成，犹遂也。昭王南游至楚，楚人凿其船而沈之，遂不还也”。（朱熹）或谓：“成游者，不成乎游也。君王而贪利轻出，丧身辱国，为天下笑，其游荒矣。”（周拱宸）或谓：“成游，谓昭王作方城之游也。省城作成。”（陈直）或谓：“成，疑巡之误。成在庚韵，巡在真韵，因声误写，（刘永济）或谓：“昭后成游”是“昭王很高兴巡游。”（郭沫若）或谓：“成疑盛字之譌。盛游，以兵车从游。即《吕氏春秋》所谓昭王亲征荆也。”（姜亮夫）……。今按姜亮夫同志此说，见所著《屈原赋校注》。在诸说中，姜说坚实可信，而发挥未尽。

我认为姜说之所以坚实可信，应当从下列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证之古字通假之例，古代典籍“成”“盛”二字多通用。如《易·系辞》：“成象之谓乾”，《释文》云：“蜀才作盛象”；《左传》宣公二年：“盛服将朝”，《释文》云：“盛音成，本或作成”；《潜夫论·志氏姓》：“太子晋幼有成德”，《风俗通》作“盛德”。不仅如此，即证之以《楚辞》古传本，“成”“盛”二字亦多通用。如《九歌·礼魂》：“成礼兮会鼓”，洪兴祖《考异》云：“成一作盛”。则《天问》“昭后成游”亦即“昭后盛游”之异文，当属可信。其次，证之以当时的史实，作“盛游”尤为吻合。据前述新出土的《史墙盘》铭文，谓周昭王“广筴楚荆，唯狩南行”，所谓“广筴”，即大规模地讨伐之意（这跟《不其簋》的“广伐西俞”，《禹鼎》的“广伐南国东国”中的“广伐义略同”）。由于军容盛大，故《天问》称之为“盛游”。又据《初学记》七，引古本《竹书纪年》，这次昭王伐楚，曾出动了“六师”，其军容之盛，可想而知。这跟《天问》称为“盛游”，也是相符合的。故“昭后成游”，实即谓周昭王以大军伐楚耳。“游”与“伐”的关系，详后。

这里必须谈及的是：跟“昭后成游，南土爰底”紧相联系的“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句中的“白雉”。王逸注谓：“以为越裳氏献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亲往逢迎之乎。”洪兴

祖《补注》又以《后汉书》“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时，越裳重译而献白雉”之事说之。但以时间言，周公与昭王不相及；以疆域言，荆楚与越裳非一地。故朱熹《楚辞集注》谓“白雉事无所见”，旧注“亦恐未必然也”。迨清毛奇龄《天问补注》始云：“按《竹书纪年》：“昭王之季，荆人卑词致于王曰：愿献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是昭王之南游，本利而迎之也。”考毛氏氏《天问补注》叙曾云：“世或窃取《天问》造饰褻积，因以为说；而浅陋者且牵引而注之于下。”其实毛氏正蹈此弊。其所谓“按《竹书纪年》”云云，并非古本《竹书》，恰为后世窃取《天问》“白雉”句而演绎出来的故事情节，不足为据。而此后不少楚辞注家多用其说，误矣。

今据《初学记》七，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昭王“十九年，天大暘，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盖当昭王涉汉遇害时，适逢天气阴霾昏暗，以致雉兔震惊窜突，此乃常有之自然现象。故云“天大暘，雉兔皆震”。（据《淮南子·览冥》云：“武王伐纣，渡于孟津，……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虽胜败之势不同，而所逢之自然现象有些相似，可供参考。）《天问》所谓“逢彼白雉”，殆指此事而言。因而《天问》的“白雉”，亦或原作“兔雉”；“白”字乃“兔”字坏其下半而致误。昭王逢兔雉而丧六师于汉水，故《天问》的“逢彼兔雉”，实暗指昭王之南征不返。清戴震《屈原赋注》附《音义》已意识到《竹书》此说当与《天问》有关，惜未究其详。至于闻一多同志《楚辞校补》认为“雉当为兕，声之误，”并引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伐荆楚“遇大兕”为证。其实仅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昭王伐楚前后就有两次。十六年伐楚，当指《宗周钟》铭文所记者，大胜而还。故十六年获胜遇兕，不当与十九年逢雉丧师混为一谈。

因此，《天问》所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实即指周昭王伐楚不返而言。稽之古籍，虽所记异词，而确有其事。如《左传》僖公四年谓：“昭王南征不复，”以及《史记·周本纪》谓：“昭王南巡狩不返，”即指此事。《吕氏春秋·音初》又谓：“周昭王亲征荆蛮，……反涉汉，梁败，隕于汉中。”《帝王世纪》则谓：“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具没于水中而崩。”（《史记·周本纪·正义》引）虽各书细节不同，但都跟《初学记》七所引古本《竹书纪年》“十九年”昭王“丧六师于汉”及《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四所引古本《竹书纪年》“昭王末年”“南巡不反”的记载是一致的。尤其重要的是：昭王这次征楚而动用“六师”，跟《史墙盘》铭文所谓“广笱楚荆”的语意相合；同时《天问》的“昭后成游”之为“盛游”，也从《史墙盘》的铭文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其次谈“巧梅”：

关于《天问》“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的“巧梅”究应如何解释，乃千多年来屈赋研究中的难题之一。根据宋洪兴祖的《楚辞考异》，“巧梅”的“梅”字，古本就有“梅”“梅”“梅”三种不同的异文。至于古今学者对“巧梅”的解释，则更为复杂。汉王逸注云：“梅，贪也。言穆王乃巧于辞令，贪好攻伐，远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后夷狄不至，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词周流而往说之，欲以怀来也。”自宋代以迄于今，嫌王注之牵强而别作新解者蜂起。例如，或谓：“巧梅，言巧于贪求也。”（洪兴祖，朱熹）或谓：“梅与枚通，马策也。巧梅，善御也。”（王夫之）或谓：“《方言》：吴越饰貌为驹，或谓之巧。郭璞注云：语楚声转耳。梅，《方言》云：贪也。”（戴震）或谓：“梅”读为“敏”，“巧敏”为便敏之义（王引之）。或谓：“梅拇同。巧梅，疾足也。”（吴文英）或谓：

“梅，悔也。言犬马是好。”（王闾运）或谓：“梅、悔并当作埤，字之误也。”“巧埤考，埤古通牧”，“考牧者，《诗·无羊·序》曰‘无羊，宣王考牧也。此考牧同义。惟彼牧谓牛羊，此谓马耳。考谓考校，周流天下，将以考八骏之德力，故曰考牧也。”（闻一多）或谓：“梅本作埤，埤牧声近通用。”“巧埤即巧牧”，“穆王好游，又得良马及善御之人，故世称其巧牧。”（刘永济）或谓：“穆王巧梅”是“穆王更加轻佻。”（郭沫若）不难看出，前人对“巧梅”一语，在探讨上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仍难定于一是。

但是，由于第一手材料《史墙盘》的出土，细读铭文，使我们对“巧梅”这一费解的词语，得到新的启示。如上所述，铭文中的“字海”二字，裘锡圭同志释为“汙谋”。他说：“海、谋二字古通（《金文编》110页）。《诗·大雅·抑》：‘汙谟定命’，毛传‘汙，大。谟，谋。’‘字海’当读为‘汙谋’，与‘汙谟’同意。”今按：裘说极是。“汙谟”当为古人颂德之惯用语，有时直称为“大谟”。如《陈侯因脊敦》中之“大谟克成”，实即“汙谟克成”。又《诗·抑》“汙谟定命”之下句即为“远猷辰告”，以“汙谟”与“远猷”相对成文，“汙谟”之义尤显。而且，《史墙盘》上文有“刑帅字海（汙谟）”，下文亦有“厥辟远猷”，也是“汙谟”与“远猷”遥遥相应。又近年扶风出土的西周《趯戩》铭文，则以“字慕远猷”相连成句。可证《史墙盘》之“字海”当为“汙谟”，亦即“汙谋”，是无疑的。“汙谋”即弘大的谋略，乃周人用此语以赞颂周穆王的业绩。

在这里，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天问》的“穆王巧梅”这句话。“巧梅”二字，实即《史墙盘》铭“字海”二字的又一异形，亦系“汙谋”之同音借字。今申其说如下：

关于“巧”跟“字（汙）”的关系：按“字”或“汙”的音符都是“亏”，而“巧”的音符则为“亏”。字各有别，音亦不同。但据《说文》云：“亏，古文以为亏字，又以为亏字。”则“亏”“亏”二字，不仅形近，声亦相通。故“巧梅”之“巧”，实即“字海（汙谋）”之“字”，亦即“汙”之假借字。魏《三体石经》中《春秋经》的“于穀”之“穀”作“晐”。“晐”的原始音符为“亏”而得与“穀”字相通假，这跟“字或‘汙’的音符为‘亏’而得与‘巧’字相通假同理。因为“亏”古有“巧”音，此乃鱼部与幽部旁转之常例。故《天问》“巧梅”之“巧”，实即“字”或“海”之转音借字，当无问题。

至于“梅”跟“海（谋、谟）”的关系：按《天问》“巧梅”之“梅”通“谋”，亦犹金文“海”之通“谋”。因“每”“某”二音符古音同在之部，故通用。《说文》梅字“或从某”作某。《诗》“標有梅”，《释文》亦云：“梅韩诗作某。”又《诗》“墓门有梅”，《列女传》八引“梅”也作“某”。此与《天问》“梅”之通“谋”，同一原因。至于“梅”之与“海”，则以音符相同而得通；“梅”之与“谟”，又以鱼、之旁转而得通。例不枚举。故《天问》“巧梅”之“梅”，实即“海”之异文，“谟”或“谋”之借字，当无问题。

故《天问》之“穆王巧梅”，实即《史墙盘》铭之“穆王”“字海”。至于《天问》“巧梅古本或作“巧梅”或作“巧梅”，跟“梅”字一样，皆为以“每”为音符之借字，其本字皆当作“谋”或“谟”。而洪兴祖，朱熹等，在“梅”“梅”“梅”字形上计较是非，已属多事；而肯定“梅”字，否定“梅”“梅”，更属郢书燕说，不足为据。

如果从意义上讲，《天问》之“巧梅”，《史墙盘》之“字海”，等于《诗·抑》之“汙谟”，亦即《陈侯因脊戩》的“大谟”，义为庞大的谋略与规划。故“穆王巧梅”，是指穆王周游天下，征徐、伐楚等历史事件而言。据《逸周书·祭公》等典籍看，穆王是个好大喜

功的人物。他曾对蔡公说：“用克彘绍成、康之业，以将大命”；又说：“以余小子杨文、武大勋，弘成、康、昭考之烈。”从口气上看，所谓“大命”“大勋”，都跟“穆王巧梅”的意义是一致的。不过前者是穆王自我夸耀，而后者则是周人对穆王的赞颂。

但对《天问》“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一节诗，历来的研究者，都只认为是指穆王周游天下而言。总之，与伐楚不相涉。而现在如果把《史墙盘》铭文中叙及昭、穆二王的事迹联系起来，完全可以看出，所谓“巧梅”或“宇海”“讨谋”，都跟伐楚密切相关。因为《史墙盘》铭说：穆王“刑帅宇海（讨谋），缙宁天子”，“刑帅”即效法遵循之意；“讨谋”即指上文昭王“广筮楚荆”的庞大规划而言。故“刑帅讨谋”，亦即穆王自己所谓弘“昭考之烈”；说穿了、即穆王能继承昭王的遗志而伐楚。“缙宁天子”的“缙”，今习俗作“重”（平声），指穆王伐楚得胜，重新稳定了周王朝的统治。这是因为昭王“南征不返”，对周王朝的统治是很大的挫败与动摇，故穆王伐楚得胜，就是对周王朝的“缙宁”——重新得到安定。我们如果用这一观点来看《天问》所涉及的昭、穆两代的事迹，也应该注意他们的联系性。即“穆王巧梅（讨谋），夫何为周流”，正上承“昭后成（盛）游，南土爰底”而来。当然，“周流”一语并不排斥周游天下的含义，但在这里，主要应包括伐楚的战役在内。因为根据典籍及金文的记载，古帝王巡游，狩猎，征伐，常常是分不开的（例如《尚书·武成·序》：“武王伐殷，往伐归兽。”《史记·周本纪》即读“兽”为“狩”，谓武王“乃罢兵西归，行狩。”《逸周书·世俘》记武王伐纣，亦言狩事。可证武王当时亦征伐与狩猎兼行。《尚书》伪孔传释“归兽”为“归马”“放牛”，极误。即《孟子》所谓“巡狩者，巡所守也”，亦后起之义。）《天问》穆王“周流”与“巡游”同义，故亦指征伐而言。这正如昭王伐楚一事，《左传》作“昭王南征不复”；《史记》则作“昭王南巡不返”；《史墙盘》又作“唯狩南行”；《天问》则直作“昭后成游”。昭王的“成（盛）游”既代表伐楚，则穆王的“周流（游）”自然也可包括伐楚。

当然，周穆王继昭王而伐楚的问题，曾为他八骏游天下的传说所掩盖，不见于《史记·周本纪》等典籍中，但地下资料却保留了不少痕迹。除《史墙盘》外，如《白帖》三，引古本《竹书纪年》云：穆王“三十七年，伐荆。”又《艺文类聚》九及《通鑑外记》三，皆引古本《竹书纪年》云：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鼃鼃以为梁。”又敦煌唐写本《修文殿御览》残卷引古本《竹书纪年》云：“穆王南征，君子为鹤，小人为飞鸢。”这些记载，虽有的已演化为神话式的传说，而实际上是真实历史的投影。故穆王时的《竞卣》铭文，亦有“隹白犀父自成自即东，命伐南尸（夷）”等纪录。事实上穆王不仅曾南伐荆楚，而史亦载其东伐徐国（《后汉书·东夷传》）。楚椒举还说：“穆王涂山之会。”（《左传》昭公四年）盖即伐楚、胜徐之后而大会诸侯于涂山。

正因为如此，《天问》所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乃针对周昭王伐楚不返一事所提出的诘问；而“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亦系紧承上文，针对穆王时包括伐楚在内的“周流”所提出的诘问。这就是《天问》这两节诗中“成游”“巧梅”的原始含义及其所涉及丰富的历史内容。

（二）屈原对昭、穆伐楚的民族态度

荆楚，是中国古代繁衍，发展于长江流域的一个相当强大的民族。周民族在没有克殷以

前，由于偏处西方，跟南方的楚民族接触不多。而殷、楚民族则常常发生冲突。《诗·商颂·殷武》所云：“挾彼殷武，奄伐荆楚”是也。迨周克殷以后，乘三监之叛，楚民族也起而与周对抗。《逸周书·作雒》云：“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所谓“熊盈”当即指楚“熊绎”而言。故《后汉书·东夷传》亦谓“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自此，周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等，几乎世世伐楚，从未停止过。这从历次出土的《令殷》《禽殷》《宗周钟》《过伯殷》《决谿殷》《竞卣》的铭文中是可以看出来的。而作为一个南方强大民族的楚国来讲，也始终没有被征服过。故周昭王时的《迺伯簠》铭文有“迺白（伯）从王伐反荆”之语。“反”，殆即背叛不服之意。

春秋时，楚民族日益壮大。周民族系统中的中原国家，被楚吞并殆尽。《左传》定公四年：吴人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故中原民族对楚民族是怀有戒心的。鲁国季文子曾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左传》成公四年）而楚民族的统治者，确实野心勃勃。楚王向周“问鼎”“求鼎”之事，史不绝书。楚武王甚至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乃自立为武王。”（《史记·楚世家》）这些史实，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一个新兴的诸侯大国对名存实亡的大奴隶主周天子统治权的极端蔑视；但另一面也说明了一个相当强大而且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的楚民族，在我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所显示出的不可避免的倔强与不驯。《公羊传》僖公四年云：“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这正概括了当时楚民族对周民族的政治态度。

因此，在周、楚两大民族的矛盾斗争问题上，必然会引起屈原对周昭王伐楚不返和周穆王伐楚获胜这两个巨大历史事件抱有自已的民族观点：

关于周昭王伐楚不返问题，《史记·周本纪》是这样说的：“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这正是周民族的统治者对昭王这次伐楚失败的真相秘而不宣的一贯态度。即共王时的《史墙盘》铭，仍然只说：“弘鲁昭王，广筴楚荆，唯狩南行”。至于“南行”的结果如何，一字不提。这当然也是“讳之也”。到了齐桓公称霸，欲借尊王之名对楚施加压力，才在召陵之会上向楚提出质问：“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而楚国对此则作了避重就轻的答复：“贡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左传》僖公四年）其实，昭王当时之溺死于汉水，既非偶然的自然灾害，也决非人民自发的反抗行为。而显然是楚国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所谓“君其问诸水滨”，表面虽未作正面答复，而实际上是表现了对昭王伐楚的满腔怨愤；故用此讽刺、幽默的口吻来回答对方的责难。这正如范宁的《谷梁传》注所云：“此乃不服罪之言。”

同样，屈原对昭王伐楚不返这事件，在《天问》里一方面借用周民族一贯的传统提法，称此举为“昭后成（盛）游，南土爰底”，亦即《史墙盘》所谓“广筴楚荆，唯狩南行”；而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指出“厥利惟何？逢彼白（兔）雉”。言外之意，即除了“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水”，又得到什么好处呢？这跟“君其问诸水滨”的字面虽然不同，而实际都是用旁敲侧击的手法对昭王伐楚的诘难与讽刺。据《谷梁传》，召陵之会楚国对齐桓公致答词者，乃楚大臣屈完，系屈原的先辈，他们都是站在楚民族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因此，意旨与态度的一致性，决不是偶然的。

其次，关于周穆王伐楚获胜的问题：穆王好大喜功，南征北伐，周游天下。当时蔡公洋

父就曾进过谏言，认为“先王耀德不观兵。”（《国语》）但《史墙盘》铭作为歌功颂德之词来讲，对穆王的行径，却是肯定的。上文已指出，所谓“刑师诎谋，纒宁天子”，即主要指穆王继承昭王伐楚获胜的武功而言。周民族的统治者，对歌颂祖先功德，似有一套固定的成语。如跟《史墙盘》同时出土的《疾钟》铭文，歌颂周文王的业绩时，就有“敷有四方，会受万邦”等跟《史墙盘》完全相同的话。因此，用“诎谋”这个语词歌颂穆王的业绩，也可能是周民族的惯用语。但周民族把征伐异族说成是弘伟的谋略，楚民族是不能接受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穆王肆无忌惮的不正当行为。《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国的右尹子革曾对楚灵王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周人说他是“刑师诎谋”，而楚人说他是“欲肆其心”，这正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右尹子革最后又说：由于祭公之谏，穆王才“获没于祗官”。这虽系警戒灵王之言，但言外之意则认为：如穆王“肆心”不止，也照样会遭到昭王“南征不返”的可耻下场。这就是楚民族对周穆王的看法。

同样，屈原在《天问》里，首先提出“穆王巧梅（诎谋）”，再加以诘问、批判。这里的“诎谋”，显然又是借用周人歌颂穆王的传统成语。所谓“穆王诎谋，夫何为周流？……”就是说：周穆王既然有诎谋远猷，为什么竟会“周流”忘返、“索求”无厌呢？这跟楚右尹子革所说的“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完全是一个意思。即对周穆王包括伐楚在内的巡游征伐是抱否定态度的。

总之，在《天问》里对周、楚民族的两次斗争，屈原的态度，跟周民族的传统看法是相反的；而跟楚国当时的民族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它既表示了一个新兴的诸侯大国对周王朝的批判，也体现了极其鲜明的民族立场和强烈的民族感情。

（三）结 语

据解放以来考古学界对长江流域史前文化遗址的考查报告，说明了六、七千年前，我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已诞生了自成体系的古老文化。它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地跟黄河流域的文化相融合、渗透，但是始终保持着浓厚的“楚文化”的特殊风貌。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已发展成长江流域的强大民族，仍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据典籍所载，无论是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乃至衣冠装饰等等，一方面对中原文化不断吸收与融合，一方面始终没有消失“楚文化”的特色。故当时对南北不同体系的文化，人们常以长江中游的楚与华夏对称。如《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明证。屈原作为楚民族政治上、文化上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评价周楚两次斗争的历史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感情，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里，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关于屈原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屈原被疏放以后，为什么不肯远游他国，以谋有所建树？

自从史迁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历代学者多论及之。例如，或谓：屈原忠于君，而君臣之义，理不容去；或谓：屈原曾被信任，故感知遇之恩，情难决绝；或谓：屈原乃同姓宗君，宗臣无可去之道；或谓：楚有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要有所建树，不必舍近求远；近人则多以爱国主义说之。事实上屈原之所以不肯远游他国，原因可能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那就是屈原的强烈的民族感情。

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势力从西陲渗入中原以后对楚民族的严重威胁，跟周人灭殷以后对楚民族的巨大压力，在某些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屈原的民族感情，表现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跟表现在对待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重新讽咏一道屈原自我写照的著名诗篇《橘颂》中的一段话：

“后皇嘉树，橘来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王逸注云：“言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而为枳也。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亦不可移徙。”按王注极是。橘逾淮而北则化为枳，据《考工记》《晏子春秋》等文献，这个传说，春秋战国时期已很流行。屈原正是借这深深扎根于“南国”泥土中的橘的形象性格，来展示自己“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执着、坚定的民族立场。我们知道，虽“楚材晋用”，在春秋时早已成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但对乐操“土风”、首着“南冠”、言称“先职”的楚囚钟仪这样的人物，还是受到当时人们的崇敬与赞扬的（《左传》成公九年）。如果说《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那就充分说明了他忠于自己民族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因此，他虽在被疏乃至被放的情况下，而对自己民族的前途命运之“险隘”、自己民族的人民群众之“多艰”、甚至对既为楚民族安危所系而又“数化”“多怒”的灵修，……低徊郁悒，愁肠百转，终不忍一去了之。这种深厚的民族感情，正是屈原为自己民族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屈原的爱国与忠君是分不开的；不如说屈原的爱国主义跟他的民族思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上接26页）

而于妇人厚？’”（中册第六九三页）此并非疑问句，而是带有强烈肯定语气的论断，故句末不当用问号，而应标为感叹号或句号。

14、《战国策年表》：“魏救卫，有齐在，而《策》不及表，亦不及齐。”（下册第一二七五页）如此标点，有乖原意。实则“亦不及齐”者，并非《策》，而是《表》，此《表》即《战国策年表》之简称。《表》与《策》，对举成文。此言魏救卫，虽实也有齐在，但因《策》不及齐，故《表》亦不及齐，作为所谓“《策》不见，虽大事不表”之实例。故此句当标为：“魏救卫，有齐在，而《策》不及，《表》亦不及齐。”

15、《战国策部分篇章通用篇名与本书篇名对照一览》中，“通用篇名”《三人告曰曾参杀人》，其对应的“本书篇名”应为《秦武王谓甘茂》，新本误作《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下册第一三三一页）。“通用篇名”《楚国食贵于玉》，其“本书篇名”当为《苏秦之楚三日》，而新本却误作《苏子谓楚王》（下册第一三三三页）。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再版时纠正。

上述意见，难免有谬误，且备一说以存疑，望整理者及读者明鉴之。